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春华

封面设计：张志明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二〇九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125印张 230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3230·270 定价：1.70元

目 录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道路.....盖 军 (1)

一、大革命失败后全党的共同探索 (1)

二、毛泽东的杰出贡献 (8)

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形成和发展的..... (17)

关于红军建军和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盖 军 (27)

一、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形成 (27)

二、关于建军原则..... (31)

三、关于战略战术原则 (4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路线

的形成和曲折发展盖 军 (54)

一、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55)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反复..... (69)

三、遵义会议后土地政策的发展..... (75)

关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几个问题于吉楠 (82)

一、“立三路线”发生的原因..... (82)

二、“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及其危害 (92)

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 (101)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陈绍禹上台于吉楠 (109)

一、早期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活动..... (109)

二、所谓“反对立三路线”的真相..... (117)

三、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行动	(122)
四、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9)
白区工人运动	盖 军(137)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斗争	(137)
二、三次“左”倾错误对工人运动的危害	(141)
三、工人运动的转折，刘少奇对工运策略的贡献	(159)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及其危害	盖 军(168)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主要错误	(168)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主要错误	(179)
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的主要错误	(183)
四、王明走后为什么还称王明路线？	(190)
五、深刻的教训	(195)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王荣光(200)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	(200)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208)
三、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217)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于吉楠(224)
一、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战略方针上 的原则斗争	(224)
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成立第二“中央”的活动	(234)
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	(239)
四、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结论	(24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盖 军(252)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	(253)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	(259)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努力 和斗争	(26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盖 军(279)

一、从大革命失败到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81)
二、六大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	(290)
三、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	(303)
四、遵义会议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	(310)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盖 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并逐步扩大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而开创出来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表明，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一、大革命失败后全党的共同探索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最终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依然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反动政权机构、反动武装和特务组织，

特别是加强了对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统治。这表明,反革命力量超过了革命力量,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新的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如何走,这是摆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毫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一) 南昌起义希图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了继续革命的决心,号召共产党员、工农群众、革命士兵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准备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开始,中共中央曾准备集合自己能掌握的武装,联合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当地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新的北伐。由于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进行清除共产党员的反动活动,联合张发奎已不可能,中共中央就决定集中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举行南昌起义,打到广东去。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从大革命失败到南昌起义前后,中共中央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有革命政权的保证。党中央指出:“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①。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革命政权,土地革命就不能进行。第二,要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武装。党中央提出了“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②,提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的关系。第

①②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1927年7月20日。

三，农民武装在公开或秘密“两种形式都不可能”存在时，“则可以‘上山’”^①，以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第四，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八七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找着新的道路”^②。这几条经验的总结，说明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南昌起义的失败说明，革命势力要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长久地占据大城市，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新的道路是什么？只有在实践中去探索。

（二）秋收起义和红色区域的建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同红色政权是一个意思。八七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立即派干部到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在中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十二个省一百三十余县，各地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许多起义保存的武装先后转入了游击战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从事实斗争的基层组织，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继续提出了一些新鲜经验。例如：

①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1927年7月20日。

②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江西省委提出：“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赣东北与赣东联络一会（块）亦形成一个割据局面”^①，提出了在发展游击战争中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湖北省委及鄂东特委致黄安县委的信中提出：“尽可能立即召集附近各县农民代表会议，引起其革命的热烈情绪，并派人到各县宣传，使革命势力很快的发展，造成割据局面”。

同一时期，党中央也在不断总结各地经验，探索着如何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例如：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在讲到武装暴动时说：“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这点，在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通告上说的较明确，“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应尽可能的发动，……尽可能的摧毁一切豪绅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在武装暴动、推翻旧政权之后，有了固定的地区就要建立革命政权。这个固定地区就是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瞿秋白发表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同上述决议一样，虽然主要方面是“左”的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但它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不能进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强调了根据地问题，指出武装斗争要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给朱德的信中，总结了南昌

① 《江西省委致中央信——目前军阀混战下江西工作的情形与最近的策略》，1927年11月30日。

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更明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中央在信中，要朱德和毛泽东“应确定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时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类似的思想，在中央给广东、江西等许多地方的指示中都讲到：在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同时，要“加紧造成一割据局面”，也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意思。

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中央和省委的一些同志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但在革命实践中碰了钉子，才认识到只打大城市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提出要在某些大城市的周围先搞一些割据的区域，形成对城市的包围，等有条件时再攻取城市。这一思想，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的中央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出来。例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立三（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继续暴动的策略时说：“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当时这一思想也被以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为首的留守中央所接受。又如，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央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广州暴动我们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认识了在全省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些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但已进一步认识到在夺取大城市之前，要有几个中心区域的割据，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一个可贵的探索。虽然它还没有认识到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已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概念。

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时候，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抑了这种积极性。一九二八年二月召开的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对停止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是错误的，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决议指出：“党领导着各省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临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其意思是农村暴动必须在城市革命高潮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胜利，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展，不能只发动农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决议案接着批评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说什么“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显然是反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游击战争，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注重以城市为中心，游击战争必然失败。这是按照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三）六大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并指出农村根据地“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这些都是正确的，说明六大是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是，六大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认为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武装暴动，主要是中心城市的暴动。因此，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以城市工人领导乡村农民；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城市，因此，城市工作占重要地位。会议有的代表认为过去党采取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策略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只有中心城市的暴动，才能使农民的自发的暴动组织起来，对重视发动农民暴动的做法扣上了“农民意识”的大帽子。

六大为什么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呢？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①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因为我们“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 农村也没有高潮，……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第二，“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因为这个原因“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到六大前后，由于全党的积极探索，都程

^① 以下引文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178页。

度不同地认识到可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六大决议反映了全党的认识水平。但是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还不等于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认识。我们所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指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中国国情的特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大城市。因此,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二者可以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有联系,是指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要有工农武装割据和这种割据的扩大;有区别,是说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不等于就有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的认识。六大虽然有人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词句,但这只是错误地批评以前农民暴动策略的。当时就全党来说,还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必须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二、毛泽东的杰出贡献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六大以后,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个估价是不过分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就是毛泽东在六大以后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 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和同年十一月,

在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这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特点。“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主要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还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要成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基础，若没有相当力量

的正式武装，仍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总结了湘南三月和八月两次失败而得到的经验。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也分析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除了上述主要条件外，还指出两条：一是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二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还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发展的经验，那就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既论证了红色政权（即工农武装割据）发生的原因，也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验。

（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初，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十多个省的三百多个县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就促使毛泽东把各个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开始形成了“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一九三〇年一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以及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从认为农村根据地是取得全国政权中间的“一

个力量”，到认为是“最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全国革命高潮，虽然还不等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但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全国革命高潮。提出农村根据地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力量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最重要因素”——农村根据地方面，就是以农村为中心，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毛泽东认为，那种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只是单纯的流动游击，是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的波浪式发展等等，“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者做到了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指出这种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胜利的思想。当然，不能否认，当时毛泽东由于经验不足，对中国国情了解还不够充分，对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某些问题上还表现着急性病。但对长期性估计不足不影响农村包围城市基本思想的形成。

（三）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

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之后，又经过对立三、王明两次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冒险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九三六

年十二月，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通过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深刻地论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是敌人的强大。第三，是红军的弱小。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理论根据。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又写出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论证了在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没有进行合法斗争和在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条件；因为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的队伍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积蓄、锻炼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阵地，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必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这就使革命力量可以利用敌人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首先发展和胜利；农业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村可以自给自足，不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